

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访书志

李致忠

一九八二年四月至九月，应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馆长吴文津先生之请，赴美国哈佛大学做短期讲学。其间除讲学之外，终日蒞事于哈佛燕京图书馆，故有幸得窥该馆所藏中文古籍。

该馆是全美著名的东亚图书馆之一。其历史之长，藏书之富，均足称道。尤其是它的中文古籍善本藏书，更具特色。从内容上讲，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皆备；从版本上讲，宋、元、明、清历代刻本均有多寡不同的收藏。特别是它的明版书，堪称少而精湛，简而赅备。并且有不少是举世罕见的珍本，很值得做一番介绍。

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

明杨士奇等辑 明永乐十四年（1416）内府刻本

明成祖朱棣用武力夺得皇位以后，面临着内外的双重压力，这促使他不得不从文治武功两个方面来加强自己的统治。武功上，朱棣虽然在南京做了皇帝，但却经常驻蹕北京，以对付北方少数民族的骚扰。文治上，更采取一系列措施，其中就包括开展《永乐大典》的编纂，《顺天府志》的纂修，以及《历代名臣奏议》的编辑等文化活动。

明郑晓《今言》第一百四十七条称：“《历代名臣奏议》，成祖敕纂之书也。永乐丙申十二月成，进览刊布。先是，上以

玺书谕太子，令翰林儒臣采古名臣，如张良对汉高、邓禹对光武、诸葛孔明对昭烈，董、贾、刘向、谷永、陆贽奏疏之类汇录，以便观览云。今此书无序，亦无监纂、编纂官职名。是时西杨在南京佐太子监国，正危疑之际也。”

这段记载，说明了两个问题。一是此书进览刊布是在永乐丙申的十二月。丙申即永乐十四年。可证此书最初刊行是在永乐十四年。一是此书既无序文，也无编纂官衔名，盖此书进呈后待朱棣御制序文。然朱棣此时驻蹕北京，忙于边务，无暇多顾。而杨士奇佐太子在南京监国，形势危疑，亦不敢贪天之功，镌落衔名。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此书，正与郑晓所描绘的状况相合，说明它的是永乐十四年内府初刻，信而无疑。且此书每半叶十二行，行二十六字，大黑口，左右双边，纸白墨黑，亦完全是明代内府刻书的风貌。此从侧面亦证明它是永乐内府原本。

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在明代盖凡两刻，一是永乐十四年内府初刻，已如上述；一是崇祯间太仓张溥的节刻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称此书为“明永乐十四年杨士奇等奉敕编……。当时书成刊印仅数百本，颁诸学宫而藏板禁中，世颇希有。”又称到了明“崇祯间，太仓张溥始刻一节录之本。其序自言生长三十年，未尝一见其书。最后乃得太原藏本，为删节重刊，卷目均依其旧。”可见永乐内府原刻传世之罕。哈佛藏有此本的全帙，不能不说是难得的。北图所藏亦是此本。

大明一统志九十卷

明李贤、万安等纂修 明天顺五年（1461）内府刻本

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《大明一统志》，为天顺五年内府原刊本，首尾俱全，堪称完璧。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二字，大黑口。各卷卷端均钤有“广运之宝”印记。足证此书非但是内府原刻，且是内府旧藏。

按“广运之宝”，永乐时尝为皇帝所专用。据明郑晓的《今言》所记载：“永乐中献陵监国南京，长陵时时北征，有所宣制，天子用‘广运之宝’，曰敕。皇太子用‘皇太子宝’，曰谕。选武官选簿御前亦用‘广运之宝’。东宫用‘功懋之记’。”可见明初对“广运之宝”的使用是相当严格的。后来藩、汉两经厂均由司礼监掌管，所以经厂所刻印的明代制书，亦常钤有“广运之宝”。

天顺五年内府刊印的《大明一统志》，传世不希，但求全帙，则不易得。北京图书馆善本书中藏有三部，但都不全。一部残存六十卷，一部残存四十七卷，一部残存三十三卷。三部拼起来，仍不能成为全璧，可见得一全帙之难。现知广州中山大学图书馆藏一部，台湾中央图书馆藏有一部。原丁氏八千卷楼藏有一部，现在下落不甚清楚，可能在南京图书馆。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全帙，实属难能可贵。

广輿图二卷

元朱思本撰 明罗洪先订补 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）韩君恩山东刻本

《广輿图》最初为元朝的朱思本所编纂，到明嘉靖时有罗洪先出而订补之，于是成了明代最有名的全国輿地全图。

据嘉靖辛酉（四十年1561）秋七月馀姚芝南山人徐九皋序称：“吾同年友念菴罗子（罗洪先字达夫，号念菴），蚤志经世，又辑《广輿图》一书，简而要，详而覆，典则之路具存。近以寄右辖柏泉胡子（指胡松），胡子乃复补遗刊误，间为论述，精练晓鬯，可按而行。既序而付之梓人，仍属余赞一言。”可见罗氏稿成之后寄给了胡松，由胡松再行补遗刊误，才镌版问世。所以此书的最初一刻，当是嘉靖四十年胡松刻本。此刻为大开本方册式，地图为整版刊印。经纬线形成的方格呈正方形，比例相当准确。北京图书馆现藏有一部。

到万历七年（1579），有钱岱出而翻刻。此刻将原来的大开本方册式，改成了较狭窄的线装式。最突出的是将原来整版的地图改成了下上两个半版的拼印，经纬格也变成了长方形，比例已不甚精确了。到清嘉庆时再翻印，即以钱岱本为底本。

这里有个问题，即明万历七年钱岱翻刻此书时，是否直接来自胡松原本，我过去始终不清楚。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此书，足可澄清这个问题。

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《广舆图》一书，文字部分为每半叶十三行，行二十五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白棉纸印造。字体为直硬方整的仿宋字，纯系典型的嘉靖朝刻书风貌。且有嘉靖丙寅（四十五年1566）夏五月巡抚山东地方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霍冀的序文，序文称“时宪副秦君、少参徐君、佥宪王君偕请于余曰：‘此侍御韩君既按兹土而授之梓者也。’”可证哈佛此书的是韩君恩所刻。哈佛此书还有嘉靖丙寅夏巡抚山东监察御史韩君恩自己的《刻广舆图叙》一道，更可证明哈佛此书的是嘉靖四十五年韩君恩山东刻本。其形制已非胡松原刻的方册式，而是变成了较狭窄的线装式。地图亦非整版刊印，而是变成了下上两个半版的拼印。取此式与万历七年钱岱翻刻本相较，则源流自明。且考钱岱行实，万历七年前后钱氏正为山东巡抚，仿韩君恩之为人，取韩君恩所刻此书，照样翻刻，亦是情理中事。由此可见，万历七年钱岱翻刻《广舆图》的祖本绝非胡松原刻，而是嘉靖四十五年韩君恩的山东刻本。足见哈佛所藏此书，是胡松原刻的方册式到较为狭窄线装式的第一个过渡本，或称为第一个改刻本。此后的翻刻，盖均源于此本。

从上述可知，此书从明至清盖凡五刻：嘉靖四十年胡松刊本为第一刻；浙江图书馆还藏有一部嘉靖四十三年刻本，图凡一百十七幅，每图版框为34.5×33.5cm，看来也是个方册式，前有嘉靖甲子（四十三年）序。按罗念菴卒于嘉靖四十三年

此本是否是他的家人或朋友刊行的纪念本，由于未见原书，不敢妄加结论。此为第二刻；嘉靖四十五年韩君恩山东刊本为第三刻；万历七年钱岱翻刊为第四刻；嘉庆四年（1799）章学濂的翻刊为第五刻。系统是胡松刊本为原刻；嘉靖四十三年刊本为再刻。这两本当属一个系统。韩君恩刊本为第一次改刻；钱岱刊本为韩本的翻刻；章学濂刊本为钱本的翻刻。这三个本子当属一个系统。从这样一个刊刻程序看，胡松原刊固然十分珍贵，但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之韩君恩山东刻本，开改刻胡松原本之先，亦属不可多得了。

广西通志六十卷

明林富、黄佐纂修 明嘉靖十年至十五年刘士奇刻 兰色印本

广西故无通志，弘治六年（1493）由提学副使庐陵周孟中始创为志。到了嘉靖四年（1525），又有提学金事琼山唐胄续加修辑。然书未脱稿，唐胄便迁官离去。前总督御史慈谿姚夔夙有志斯事，但遇边警，用兵不暇，因又委之参政琼崖黄芳勤补，未竟，亦迁官他去。直到嘉靖九年（1530）秋天，才有黄佐继而纂修。然稿甫就绪，是年冬天黄佐又因省亲而远离。但黄佐离去之前又将此事交待给梧州同知舒柏等人，请他们因旧稿稍加校订。嘉靖十年（1531），姚夔平定新宁之乱以后，于是年秋天便自羊城返回苍梧，再阅前稿，手自窜定，始秩然成书，遂以椠梓。可见嘉靖《广西通志》的成书是相当曲折的。

此志卷尾镌有黄佐的后序，序称：“既成书，则梧州知府刘君士奇实提调梓楔，合六十卷为裘。”适见主持雕印此书的人，则为梧州知府刘士奇。然刘士奇究竟在哪年镌刻此书，由于黄氏后序没有明题，且无后序年款，仍无法断定。只有通过考察刘士奇的行实，才能大体推定。

考刘士奇，字邦正，号石桥，顺德人。举正德进士，受刑

部主事。谏论平允，遇事刚方。以郎中出知梧州府，操履廉介。长宪江西，风纪肃然。晋山东右布政使。

关于刘士奇出知梧州府的年限有两说，本志和崇祯《梧州府志》均说他是嘉靖六年（1527）出知梧州；康熙《梧州府志》却说是在七年。据崇祯《梧州府志》记载，刘士奇下一任的梧州知府是翁万达，于嘉靖十三年（1534）上任。算来刘士奇做梧州知府达五、六年之久。据本志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蒋冕序称：“明年辛卯（嘉靖十年），公（指姚镛）既平新宁之寇，其秋自羊城抵苍梧，再阅前稿，手自窜定，始秩然成书，遂以椠梓。”则知此志于嘉靖十年（1531）便已成书，并上板开雕了。而此时刘士奇又恰在梧州知府的任上，与黄佐后序所说“则梧州知府刘君士奇实提梓楔”语，在时间上正相吻合，故此书之刻当始于嘉靖十年。

然细检此志内容，又出现了齟齬处。此志卷四载总兵柳珣为嘉靖十四年（1535）九月任；左江参将孙健武于嘉靖十五年（1536）到任，这岂不与“刘君士奇实提调梓楔”相矛盾了吗？岂有十年刊刻出十四年、十五年记事的道理呢？问题大概是始雕此书实为刘士奇提调，但过两年刘迁官他省，镌楔之事还尚未訖功，故后任之官亦得相继刻入。所以此志的版刻年限当是嘉靖十年至十五年。《中国方志综录》著录此志的版刻年分为嘉靖十年，如以始刻年分计算，此说也不算为过。若从书的实际出发，仍以定为嘉靖十年至十五年刊本更为确切。

哈佛燕京图书馆藏有此志，且为兰印。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，小字双行同，白口，四周单边。白纸兰印，行格疏朗，是典型的嘉靖时期刻书风貌，足资珍重。据知，此志除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与之相同外，日本内阁文库可能也藏有此书。除此之外，尚不清楚什么地方还有珍藏。其实此志不仅传世稀少，且为现存广西全省最早的志乘，可见其价值之高。

固原州志二卷

明刘敏宽等纂修 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刘汝桂刻本

现存最早的《固原州志》，就个人所知，当推明嘉靖时杨经等纂修。嘉靖十一年（1532）刊刻的版本。北京图书馆原藏有一部，抗战前夕，为躲避兵燹，随同其他善本书运往美国寄存，六十年代初又运往台湾。现原书寄藏在台湾中央图书馆，北图藏有胶卷。

现存次早的《固原州志》，就算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这一部了。此志前有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）夏吉旦，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兵部左侍郎安邑刘敏宽序，惜序中未明题刻书事宜。然目录后有：总督陕西三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金都御史刘敏宽；整饬固原兵备道陕西右布政兼副使董国光校；固原监收同知李永芳，固原州知州刘汝桂等衔名，后序尾缺。此书为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白绵纸印造。定为万历四十四年刘汝桂刻本，可信而无疑。

此书北京图书原亦有收藏，亦在抗战前夕运往美国，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。据知现在国内除台湾藏有此本外，中央民族学院、天津市人民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江苏地理研究所、天一阁、湖北省馆等，也都藏有此本。

太原府志二十六卷

明关廷访修、张慎言纂 明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刻本

志补四卷

清顺治间刻本

《太原府志》现存最早者，盖推此本。此书有万历壬子（四十年）孟冬钦差清军驿传盐法道山西按察司副使关廷访的序文，序称“……于是檄蒐采以拾补订，更正于见知。复取庠

弟子员韩士元笥存先乡申万京兆遗稿，授庠博张君慎言辑之。託阳曲令梁君之恒校之。其综覆折衷之柄，则恳乡绅同卿王念夔云。不数月而帙就，为卷凡二十有六卷……。适余以叨转移署，会今郡守阎熊耳继至，锓梓乃竣。守下车方初意即余意，且以序请。”可证此书实为万历四十年刻本。

然哈佛燕京图书馆将《志补》四卷与此书一道著录，均题万历四十年刻本，就正误参半了。《志补》四卷的记事起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，中间非但涉及甲申之变，而且顺治九年的事都已经出现了。足见《志补》绝非万历刻本，而是清顺治间刊板了。

此志北京图书馆原亦有藏本，亦在抗战前夕运往美国，现亦藏在台湾中央图书馆。但据知北京大学、天津人民图书馆、山西省图书馆、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等，也都有收藏。

潞城县志八卷

明冯惟贤修、王溥增修

明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刻 天启五年（1625）增修本

《潞城县志》，就个人所知，现存不但当推此志为最早，而且当推此本为最少。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此本，卷四至卷六亦属抄配，唯首尾尚是原刻。书前有万历十九年冯惟贤序、天启五年王溥序。卷末又有尾题，称“冯惟贤曰‘不佞顿忘芜陋，辄以五载见闻与旧抄参互考证，妄自笔削，遂捐资付之剞劂，始于辛卯岁之四月上旬，迨六月下浣告成’。”

按：⁴⁷辛卯即万历十九年，故此书实为万历十九年冯惟贤刻本。到天启五年王溥增补了某些后续内容，但卷数及原版刻并未改动。故此书版刻当题为“明万历十九年刻天启五年增修本”。

此本传世极罕，国内似仅有清代的传抄本。国外除哈佛燕

京图书馆外，尚不知何处还有收藏，故哈佛此书足资珍重。

吴江县志二十八卷首一卷

明徐师曾、曹一麟纂修

明嘉靖三十七年（1558）至四十年（1561）刻本

国内现存最早的《吴江县志》，当推莫旦纂修的弘治志，其次就是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此志。国内图书馆所藏除天津人民图书馆外，其余如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吉林大学图书馆等所藏，均非全帙。北京图书原来藏有此志的全书，抗战前夕运往美国，现藏台湾中央图书馆。北图还藏有一部，仅存二十卷。所以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此书，并非贵其少，而是重其全。

哈佛此书为每半叶八行，行十六字，白口，左右双边。白绵纸印造，书品亦佳。前有嘉靖戊午（三十七年）曹一麟序，序称：“邑旧有志，而给谏徐君师曾近为纠正而新之，颇备焉。乃访诸徐君……，君携此重上虎丘，杜门踰数月而全书于是乎成焉。书成……，于是鳩工侵梓，以永其传。”足见此志始刻于嘉靖三十七年。

书前又有嘉靖辛酉（四十年）徐师曾序，序称“嘉靖丁巳（三十六年）……，安丘曹侯一麟来知县事，索观旧志，鲜有存者，询诸缙绅，僉谓余尝从事乎此而未就也。侯遂十月絨币顾余于郡城之寓舍，以志为请。余辞不获……，余然后启敝篋，检故稿，订故实……。明年六月余稿成，而公之书亦至。侯遂命工侵梓，贮诸公藏，以传于后人。工未竣，侯以事去。又明年己未李侯迁梧来代其任，取阅数卷，谓不可中辍也，命毕其事。辛酉（嘉靖四十年）夏，梓事告成，问序于余。”足见此志镌板的最后完成当在嘉靖四十年，故此书的版刻当题为“明嘉靖三十七至四十年刻本”。

哈佛燕京图书馆还藏有一些明代志书，如嘉靖十八年

(1539) 修刊的《常熟县志》十三卷，万历三年（1575）修刊的《会稽县志》，万历四年（1576）修刊的《崑山县志》，万历九年（1581）重印续修的《彰德府志》及《彰德府续志》，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）杨氏夷白堂刊本的《海内奇观》，万历四十七年（1619）刊本的《明州阿育王山志》、崇安孙世昌刊本的《武夷志略》，天启四年（1624）金陵香雪草堂刊本的《金陵图咏》，明天启七年（1627）刊本的《一握坤輿胜迹》，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山阴吴氏刊本的《今古輿地图说》，崇祯间郎润堂刊本的《地图综要》等，虽然算不上什么希世之书，但传世者也是屈指可数的。当然，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志书还远不只此数种，实际他们所藏明、清两代的志书约有三千多种，在全美东亚图书馆中实为佼佼者。

增广事联诗学大成三十卷

元至正十四年（1354）鄞江书院刻本

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此书，为每半叶十四行，每行字数不等，小字双行，行三十二字，黑口，四周双边。竹纸印造，书品尚佳。目录后有“至正甲午中秋，鄞江书院重刊”牌记，可证此书实为元代刊本。

考鄞江书院，旧称在浙江鄞县县治正西，实际则应在县治东南狮子桥的东北，以故鄞江门而得名。元朝末年，儒者张式良在此兴建了鄞江书院，并讲学其中。哈佛此书即是该院所刻之书的一种。

元代书院刻书不仅多，而且好。顾炎武称元代书院刻书有三善，从哈佛所藏此书可见一斑。

北京图书馆亦藏有此书，其行款、字数、版框、边栏、字体形态等，均与哈佛所藏此书完全相同，可证两部纯系同一版本。然北图此书目录后原有的刻书牌记被书贾有意割去，失去了考定版本的确凿依据，故北图谨慎地定为明初刻本。今赖哈

佛此书牌记尚存，北图的原著录亦可以修正。

诗词赋通用对类赛大成二十卷

元至正二十年（1360）至二十六年（1366）陈氏秀岩书堂刻本

此书与《增广事联诗学大成》是同类性质的书，多为书铺子所为，哈佛所藏此书亦是书铺子的产品。每版行数不等，字数亦不等。目录后有刻书牌记，称“旧编诗对大成盛行久矣，今再将赋对珍珠囊择其切要可通用者，逐类增入骈俪材料，实为详备。卷末巧对一集，仍复增益新奇，以充阅玩。视他略本，大有逕庭。至正庚子莒节陈氏秀岩书堂梓行，幸鉴。”可证此书于至正二十年（庚子）已开始镌刻。古时五月又称蒲月。蒲即菖蒲。此称莒节，盖五月初五。卷二十后又有“岁次丙午菊节，秀岩书堂新刊”牌记。又说明此书盖在至正二十六年（丙午）镌刻讫功。古时九月又称菊月，菊节盖九月初九。所以此书之刻前后用了六年多的时间，盖随辑随刻之故。

哈佛燕京图书馆还收藏《韵府群玉》一部，目录最后一叶的下半叶亦有“戊申春东山秀岩书堂刊”牌记，哈佛燕京据此定为元至正二十八年（1368）刻本。至正二十八年是戊申，然洪武元年亦是戊申。据《明史·太祖本纪》称：“洪武元年春正月乙亥，祀天地于南郊，即皇帝位。定有天下之号曰明，建元洪武。”分明是戊申春正月即已建元洪武，戊申春东山秀岩书堂刻的书，再怎么也该题明洪武元年刻本了。可见秀岩书堂乃是元末明初经营刻书的一个出版家，对于研究元末明初的出版事业，应当是个很好的实例。

此外在子部书中，哈佛燕京图书馆还藏有宋闽刻六子本的《扬子法言》，元至正二十六年（1366）刊本的《图绘宝鉴》等，也都是很珍贵的。

元松乡先生文集十卷

元任士林撰 明永乐三年（1405）任勉福建刻本

任士林，字叔实，号松乡。生于南宋理宗宝祐元年（1253），卒于元武宗至大二年（1309），年五十七岁。任士林的先祖本是四川绵竹人，到他八世祖的时候迁至庆元之奉化，一直到他，定居奉化已有八世，故松乡称为奉化人。任士林自幼颖秀，传说六岁即能属文，大父奇之，口授古文百馀篇，经耳不忘。父丧，造庐墓旁，读书其中。凡诸子百家之言，靡不周览。乡子弟多从之受学。县令招之以礼，使之经理文公书院，并执教其中。至大初年，擢为湖州安定书院山长。旋因长子任耒病甚，忧郁不乐，染呕疾卒于杭州客舍。

任士林的作品，集中反映在《松乡先生文集》中。此集收其平生所著诗、赋、记、序、碑、铭、传、赞、杂著等五百六十篇，釐为十卷。从元至清，五百多年中此集盖凡三刻一修一录。

《松乡先生文集》的最初一刻，是在他辞世之后的二十五年，即元至正四年（1344）首由浙江行中书省雕版印行的。该本现在虽已失传，但从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永乐三刻本，大体可以推知它的面貌，从哈佛所藏泰昌元年刻本，更可推知它的文字内容。

该本前盖首冠松乡先生的友人，中顺大夫、泰州尹兼劝农事赵孟頫撰文并书的《任叔实墓志铭并序》，对其一生的为人品德，行实事迹，文章造詣等，做了如实地评介和记述。

次为他死后十八年，即泰定四年（1327），其生前老友陆文圭对该集传抄本的简要评述。称“良金美玉定价于当时，而文人才士定价于身后。叔实未歿时，忌而訾之者亦有之矣。”又称“泰定间，公之嗣子良吏于澄川，因出先生手泽示余，将摹而传之，余然后尽睹公之文。记、序、碑、铭，高古特甚，

长吟短韵，清雅有馀，无一点尘俗气。近世号为文士略无能过之者……。膳本脱误数十字，余一一是正，而归之于子良慎宝之矣。”足见松乡死后十八年，文集还未刊版行世。

再次是后至元二年（1337）邢泰的序文，称“先生才裕而学博，理足而词胜。无奇奇怪怪之习，有浑浑浩浩之气……。今四明以《松乡集》重，无疑也。陆子方（指陆文圭）名世具眼，向已订正而序之，且即世矣。叔实之子子良来为浙江司理官，欲侵诸梓，以广其传。余喜其不私于家也，亦为之书。”可见到后至元二年，此集尚处于欲刻而仍未成为事实的阶段。

再次则是杜本的序，称：“右《松乡集》者，四明任叔实甫所制诗、赋、记、序、碑、铭、传、赞、杂著之文，总若干卷。其嗣子良江浙行中书省理所案牍官，今杭州路太守任公欲其文之传于世也，就子良求其稿而刻之。”至此，《松乡先生文集》方首次版行于世。惜此序未落年款，故首刻年分尚不能直接确定。

哈佛燕京图书馆还藏有一部此集的泰昌元年刻本，其前所存的序文、识语，对于考证此集的首刻年份很有帮助。如自称为任士林同邑后学孙能传的一段识语，称“万历乙巳（三十三年1605）春，予校阁中藏书，有《任松乡先生文集》四帙，乃元至正四年（1344）浙江行中书省旧刻。为记四十一，首志铭九首，传六首，敍二十一首，说引八首，赋十八首，杂著二十二首，诗三百六十八首，杂著二十三首，凡十卷。先生为予乡先哲，今其集多亡缺不可得，幸藏在秘阁，岿然若鲁殿灵光之独存，亦予邑文虬之光也。”

这段识语，不但明确回答了《松乡先生文集》的初刊，是元至正四年浙江行中书省刻本；而且表明此集的名称是《任松乡先生文集》；还说明到明万历时，此集的元刊本就世已稀见，唯内阁的中秘藏书中存有一部，故孙氏得以抄传。此为《松乡先生文集》的第一刻。

《松乡先生文集》的第二刻，盖为永乐三年（1405）任勉福建刻本。此本传世极罕，就个人所知，似只有北京图书馆和哈佛燕京图书馆各藏一部。然而这两部书均缺乏直接的证据以资考定，致令两馆对它的版本亦均考定得有所不当。哈佛馆所藏的一部，原是中国燕京大学的藏书。抗战时期寄存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，现移存哈佛馆。此本原燕京大学就定为元刻本。哈佛馆至今袭用此说。北京图书馆所藏的一部与哈佛此书的版式、行款、字体风貌、印纸墨色，乃至断版裂痕都完全一样，说明纯系同一版本。然两处的考定一处拔高，一处压低，都没有做出具体明确的判断。推其原因，都有可谅解处。哈佛此书，目录及各卷卷端之题名，均系《任松乡先生文集》，与孙能传当年在秘阁所见到的至正本题名完全相同。加之书前序文亦都是元朝人的手笔，版式风格也颇类元刻气息，故误定为元刊，似不难理解。北图一部虽与之相同，但目录及各卷卷端之题名，均系《元松乡先生文集》。书前虽亦有元人诸序，但已明题“元松乡”，显系明朝人对前朝人的称谓了，所以定成了明初刻本。当然，定为明初刻本并不算错，只是不够具体。至于定为元刊本，那就绝对是错了。

首先，此书的印纸墨色、字体风格等，均是福建刻书的风韵，而绝不类至正时浙江刻书的风貌，因疑此书盖是福建刻本。

其次，以北图所藏此书各卷卷端之题名，与哈佛馆的一部相应核对，立刻就会发现各卷卷端所题之《元松乡先生文集》的“元”字，哈佛一部全部被剝改成了“任”字。而这一字之差，关系颇大。题“元松乡”，肯定是明朝刻本，因为此题法显系“元朝松乡先生”之义。“元”字一改成“任”，则失去了这个时代的制约，且正与元刻本题名相符，所以极易乱人眼目。此种马脚一败露，反可证明哈佛此书绝对是明刻本了。

然仅证明到此，问题还是没有明确解决。幸喜，哈佛燕京

图书馆还藏有一部此集的泰昌元年（1620）句章任氏刻，清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孙锵重修本的《松乡先生文集》。该本前保存了一道永乐三年冬十一月国子祭酒同修国史胡俨的序，序称“四明任松乡先生诗文十卷，凡若干篇，旧有诸先生序冠其端。其孙，今福建参政勉既梓以传，复来征余言。”且该书前还有泰昌元年邬鸣雷的序文一道，称“先生之集向有刻行，王厚斋先生埒之以班、韩，胡祭酒先生重之如太史公。”这两道序文足可证明永乐三年的确在福建刻过此集。加之前边说的此书颇类闽刻风貌，因定此书为“明永乐三年任勉福建刻本”，应当是完全可信的。此为《松乡先生文集》的第二个刻本。

《松乡先生文集》的第三个刻本，即是明泰昌元年（1620）句章任氏刻本。此刻所依据的底本仍是元至正四年浙江行中书省刊本。该本前有同邑后学孙能传识语一段，前文已经引述，不再赘引。清光绪十六年（1890）冬，孙锵修补泰昌元年版片，重行印刷时亦写了一道后跋，称“是版为前明万历、泰昌间镌本，实余远祖一之（指孙能传）先生始从秘阁抄传，去元至正旧刻已二百七十馀年矣。今去泰昌亦二百七十馀年，而修残补缺，得复旧观。”这里的所谓“从秘阁抄传”，指的就是孙能传于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）校秘阁藏书时所见到的元至正四年浙江行中书省旧刻。当时由孙能传从秘阁抄出，于泰昌元年镌版行世。可见泰昌元年刊本来源于元至正本。此为《松乡先生文集》的第三个刻本。

泰昌本以后，此书再未重新镌行，只是到光绪十六年，孙锵重修一次泰昌版，刷印行世，可见仍是至正本的系统。此为《松乡先生文集》的一修。

乾隆时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馆臣们对松乡先生的文章有尖锐的批评，但也有如实的褒誉，最后还是收进了《四库全书》。此为《松乡先生文集》的一录。

前边所说的从元至清五百馀年间，《松乡先生文集》盖凡

三刻一修一录，正是上述之谓也。

这里还有个问题需要做个简略的说明。即此集的元至正本、明泰昌本、清光绪重修本，乃至《四库全书》收录本，盖均同属于一个系统。而永乐三年任勉福建刻本在刊印时虽亦必依据至正本，但此本离至正本问世毕竟只不过六十一年，距任士林辞世也不过八十余年，又是任氏的孙子所操办，因此在蒐集遗佚、订正讹误上必有不少长处。惜至正本早已失传，无从核覆。但以永乐三年本粗校泰昌本，仅从两本目录看，文字已见不同。若与清光绪孙鏞重修本相校，则文字出入更为明显。所以这个永乐福建刻本，当是此集的另一刻本，而且是现存此集的最早刻本，其价值之高不言而喻。

此外如明嘉靖三十一年（1552）刻本的《苑洛集》，二十二卷，举世不算稀见，然哈佛所藏为四库底本，这就比较难得了。

哈佛燕京图书馆还藏有一部分戏曲、小说也比较有价值。据吴晓铃先生称，可能有如下数种比较少见：剧曲如明世德堂刊本的《新刊重订出像付释标注音释赵氏孤儿记》；明末刊本的《新刊袁中郎先生批评红梅记》；启贤堂刊本的《扬州梦》；读书坊刊本的《怡云阁金印记》；明金陵唐氏刊本的《新刻全像点板张子房赤松记》、《新刻全像汉刘秀云台记》；明刻本的《怡春锦》；明末刻本的《盛明杂剧初集》、《杂剧新编》；清内府刻朱墨套印本的《昭代箫韶》；清内府刻五色套印本的《劝善金科》；刊本《桃花影》；抄本《西川图》等，都是刻印较早、较好，而且流传较少的。小说如《新刊音释旁训评林演义三国志史传》二十卷；《新镌金像武穆精忠传》八卷；《皇明英烈传》四卷；《新编剿闯小说》十回；《警寤钟》四卷十六回；《醒梦骈言》；《生花梦》四卷十二回；《万斛泉》十二回；《人间乐》四卷十八回；《巧联珠》四卷十五回；《醒名花》十六回；《梦花想》十八回；《两肉缘》十二回；《世无匹》四卷十六回；《双合欢》十二回等，虽然不敢说都

是传世的孤本，但毕竟都是流传不多的小说。

其实还不止这些，像金人瑞贯华堂镌板七十回本的《水浒传》；崇祯间钱塘金衙刊本的《禅真后史》十集十卷六十回；明金陵三美堂刊行的《镜香园毛声山评第七才子书》十二卷，首一卷，图二十幅；万历间吴兴茅彦徵重刊巾箱本的《齐世子灌园记》三卷；明书林萃庆堂刊本的《新镌全像一见赏心编》十四卷；明末刊本的《新镌全像通俗演义隋煬帝艳史》八卷四十回；万历间三山道人刊本的《新刻全像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》二十卷一百回；最乐堂刊本的《草木春秋演义》三十二回；明崇祯间金闾叶敬池刊本的《新列国志》一百零八回；明崇祯间刊本的《新刻按鉴编纂开辟衍绎通俗志传》六卷八十回，图一卷；明末刊本的《李卓吾批点残唐五代史演义传》八卷六十回；明书林存仁堂、陈怀轩刊本的《新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》四卷；明万历间刊本的《仙佛奇踪》五卷、《仙佛证法》二卷等等，也都是刻印较早较好，而且流传较少的。

还有一种剧曲节选的集子，名为《歌林拾翠》，凡两集，为金陵书林奎璧斋刻，宝圣楼、大有堂递修巾箱本，哈佛燕京图书馆认为流传极少，且很珍重。其实奎璧斋本《歌林拾翠》并不少，仅北京图书馆普通线装书中就藏有三部，此外北京市人民政府图书馆、大连市图书馆等，亦都有收藏。真正少的《新镌歌林拾翠》，分为六卷，为梨花主人选辑、西湖漫史点评、明崇祯间刊本。此本北图只藏残帙，唯浙江图书馆藏有全书，堪称孤本。哈佛馆并不藏有此本。

此外还有几种书，只在这里捎带着说一下。这几种书本是中国的古书，但因其内容极其荒唐淫秽，故历代都是禁书。然在西方世界看来，是研究性生活的珍贵资料。因此，在中国虽然失传了，其中有些由荷兰人高罗佩翻印，在西方世界不少图书馆中倒有收藏。这几种书是：《春梦琐言》、《花营锦阵》、《秘戏图考》与《秘书十种》。据说这几种书产生于中国的明

朝万历年间，版亦为万历间镌。后来此版被日本购去。高罗佩驻日本时期又将此版购至荷兰，从新刷印。哈佛所藏即是高罗佩的刷印本。这几种书在中国已失传，故略记几笔，以资稽考。

莫等闲斋主人考

傅惜华《清代杂剧全目》卷六云：“莫等闲斋主人，姓、名、字、号、籍里，均无考。生平事迹亦不详，约为清末时人。所作杂剧一种，尚传于世。……民国五年上海中华书局排印本，标名：《孟谐传奇》。……虽题名‘传奇’，实为六折杂剧。”傅先生未及细察，把一册的六种杂剧，误为一本六折杂剧。莫等闲斋主人还著有《病玉缘》传奇一种，民国六年中华书局铅印本。作者为民国人，也不应列入清代。这都见于《中国近代传奇杂剧简目（下）》（载《文献》第七辑）。

阿英《晚清戏曲小说目》除著录莫等闲斋主人著《病玉缘传奇》外，还著录其翻译小说一种：“《奈何天》，俄亚历山大杜卢著。光绪三十四年（一九〇八）改良小说社刊。”此外，还著录汪笑侬著的地方戏《瓜种兰因》，首有甲辰（一九〇四）垂虹亭长（陈去病）序，次笑侬题词及莫等闲斋主和韵等。

上述均不详作者为何许人，今略作考述。

《（福州）陶江林氏族谱》（1929年铅印本）中有《林氏义姑事略题后》署“长乐莫等闲斋主人陈天尺撰题”。

民国间闽县郑容《无辩斋诗》最后一首诗为《读〈病玉缘〉传奇，赠陈尺山》。

民国间闽侯郑祖荫《种竹山房诗》有好几首酬赠陈天尺的诗，其中作于1920年的《次前韵，酬陈天尺四首》。

以上资料对研究陈天尺创作《病玉缘》传奇和《孟谐》六种杂剧都很有用处。今人郑丽生先生根据他的所见所闻，写有陈天尺小传，收入他的《闽中广记》（稿本）中：“陈天尺原名尺山，字昊玉，号韵琴，长乐人。清末参加同盟会，曾游学英国，入民国以医为业，被选为中国国医馆福建分馆馆长。工词章，尤擅游戏文字，所著杂剧有《孟谐》一种，敷衍《孟子》‘齐人一妻一妾’事，中华书局出版。小说有《武夷晚照》、《双莲花》多种，光复后在福州《南声报》、《华报》连载。”1933—1934年福州《华报》分期刊载陈天尺的《闽谚声律启蒙》，陈天尺卒于1934年以后。

官桂铨